

儒生文丛



第二辑

政治儒学评论集

任重◎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儒生文丛



第二辑

政治儒学评论集

任 重◎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政治儒学评论集/任重主编.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620-4946-3

I. ①政… II. ①任… III. ①儒学—文集 IV. ①B2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7312号

- 书 名 政治儒学评论集 Zhengzhi Ruxue Pinglunji
-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北京100088 信箱8034分箱 邮编100088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8908325(发行部) 58908334(邮购部) 58908524(编辑部)
- 承 印 国安华明印刷厂
- 规 格 880mm×1230mm 32开本 12.125印张 280千字
- 版 本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620-4946-3/B·4906
- 定 价 36.00元

-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总序

蒋庆/

儒生者，信奉儒家价值之读书人也。“儒生文丛”者，儒家读书人之心声见于言说者也。天运往还，儒道再兴，儒生之见于神州大地，数十载于兹矣。今日中国文化之复兴，端赖今日儒生之努力，而儒家价值之担当与夫中国慧命之所托，亦端赖今日儒生之兴起也。归来乎，儒生！未来中国之所望也！

“儒生文丛”主编任重君，儒生也。倾一己之力，编辑“儒生文丛”，欲使国人知晓数十年来儒家回归、儒教重建与儒学复兴之历程，进而欲使今日之中国知晓当今儒生之心声。故“儒生文丛”之刊出，不特有助于中国文化之复兴，于当今中国之世道人心，亦大有补益也。

壬辰夏，余山居，任重君索序于余，余乐为之序云。



蒋庆先生之思想史意义

——《政治儒学评论集》代序

姚中秋*

去年，笔者曾在微博上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蒋庆先生是六十年来大陆唯一思想家。”此论断在网络上固然引起巨大争议、甚至是嘲讽，网下以政治思想为专业的学者朋友，也多有微词。

然我不为所动，始终坚持这个看法。任重先生编辑这本《政治儒学评论集》，邀我为之作序，得机会参考诸位先进之赞与弹，并因此而系统地重读蒋庆先生三本大著：1995年出版之《公羊学引论》、2003年出版之《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2012年出版之《再论政治儒学》，对自己的看法，比这更有信心。

为论证这一观点，我撰写了这篇也许有点太长的序言。我将指出，蒋庆先生在四个方向上打破了百年来中国思想界营造的并被人们普遍信持的思想、价值和观念迷信，树立了中国思想之主体性，建立了中国人思考政治问题之基本范式，因而足当唯一思想家之誉。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一、恢复儒学之完整性：政治儒学之提出

讨论蒋庆先生之思想贡献，首当注意者自然为“政治儒学”概念之标举。

政治儒学乃针对心性儒学而提出。在“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中，张君勱先生疾呼“新宋学之复活”^{〔1〕}，在当时全盘反传统的特定语境下，具有重大思想史意义。

20世纪初，炫目于西方之坚船利炮和社会治理，儒家士大夫群体发愤学习模仿，乃有废书院、废科举、废读经之举。此前，经、史、子、集的中国固有思想学术体系与以经学为主的教育体系互为表里；教育体系之全面西化，导致中国既有思想学术体系逐渐崩溃。在新式学校接受教育的学者、知识分子则秉持历史主义理念进一步断定，中国既有思想学术体系是过去的、古代的，不具有回应现代问题的能力。曾被视为常道的“经”被历史化，成为人们运用现代价值、知识进行研究、剖析，最后予以清理的对象。

也正是依据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态度，西方汉学家曾提出一个著名命题：儒家已“博物馆化”。确实，自新文化运动之后，在主流思想学术界，儒家已经完全变成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主题，此即胡适等人提出“整理国故”之预设，中国既有之思想，主要是儒家，已成为“故”了。

在这种背景下，具有保守主义倾向之学人如梁启超、张君勱、熊十力，一心护持中国文明，然欲进而不能，乃不能不有所舍弃，沿着张之洞“中体西用”之思路，退守“心性儒学”，

〔1〕 张君勱：“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载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977页。

集中于探究个体成德成圣之学，而将公共领域交给西学，也即科学与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虽然是作为新文化运动之反动登场的，仍带有该运动之深刻思想与观念铭印。

此后，新儒家基本上就是心性儒学，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四贤于1958年发表之《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断言：“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1〕}作为现代中国最为有影响力的思想流派，新儒家的儒学观塑造了学界、公众的儒学观，人们普遍以为，儒学就是、也应当是心性之学。这种儒学观影响极大，港台海外儒学基本上是心性儒学；大陆儒学于20世纪90年代复兴之后，也几乎皆为心性儒学及其衍生物和心性儒学史之研究。

毫无疑问，心性儒学在20世纪艰难的思想、知识与政治环境中，守护了儒家之命；心性儒学之思想成就，比如牟宗三先生所构建之宏大哲学体系，也是20世纪中国唯一可观的思想与哲学成就。不过，心性之学确实遮蔽了“儒家的整体规划”^{〔2〕}，它的成立也确实以拱手让出公共生活之治理于西方思想和制度为前提。由此导致港台新儒家身处大变动的时代，却无力参与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制度之理论构想，更无力参与制度构建之实践过程。因而，在台湾地区转型之后，新儒家迅速陷入困境，而在社会中不具有强大的发言权。而台湾地区社会虽为一儒家社会，却缺乏足够的思想与观念自觉，没有强有力的儒家声音提撕、引领社会。

这一点，被包括蒋庆先生在内的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

〔1〕 载程文熙编：《中西印哲学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866页。

〔2〕 参见余英时：“试说儒家的整体规划——刘述先先生《回应》读后”，载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912页及以后。



的大陆儒家认识到了。蒋庆先生坚信，当下中国之治理秩序并不健全，需予重塑。而儒学从遥远的中国文明深处而来，且依然具有活泼的生命。儒家就是中国之本质所在，中国之合理秩序应当就是儒家主导之秩序。因此，儒家应当仁不让，积极参与乃至主导当下中国社会合理秩序之塑造过程。

然而，儒家究竟以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蒋庆先生截断 20 世纪之主流儒学传统——心性儒学，而别开生面于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即系统提出“政治儒学”理念。《公羊学引论》自序清楚说明政治儒学之立论宗旨：

世有论儒学为“为己之学”者，言现代儒学之最大功用在于成德成圣，不在经世治国，其言下之意谓今日经世治国非西学不能为功，儒家之政治智慧已为出土文物矣。是书之作，欲拨正此论，证明儒家之政治智慧仍未过时，在今日仍有其价值，乃建立中国政治理论不可或缺之丰富思想资源也。^{〔1〕}

《公羊学引论》的宗旨就在于恢复儒学整体规划之完整性。儒家之努力，可大体归类为两项：养成君子，治平天下。前者需要个体之成德成圣，这当然至关重要。然而，不论孔子、孟子，哪怕宋明儒学典范之奠基者二程，也都充分认识到了制度对于治平天下之决定性意义。制度对于个体生命具有决定性意义，制度对于儒家之生命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只是，在当时，儒者无需特别强调制度之重要性，因为在传统中国，立法者不能不归向儒家，哪怕是征服者。儒家天然地占有教育领域，儒家就是生活，儒家借助经、史之学也掌握着制度设计之知识，因而，儒家始终有机会参与制度的设计和构建。在此背景下，孟子、宋明儒关心于君子之养成，是完全合理的。

〔1〕 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 页。

但在现代，包括当下之中国，情形完全不同。在深刻地漠视传统乃至反传统的现代教育所塑造之主流精英中，儒家反而丧失了在中国存身之正当性。20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制度及其背后的理念之竞争，几乎都是在不同的外来观念、蓝图之间展开。参与竞争的精英立场可能完全相反，但他们共享一个信念：儒家已死，儒家毫无意义，甚至构成中国建立现代制度之障碍。对儒家如果确实需要什么政策，那也只是更为彻底地铲除儒家。在如此扭曲的精神结构支配下之制度变革过程中，儒家被驱逐，几乎没有任何机会介入。

在这种文化政治环境中，哪怕只是为了自身生存，儒家也必须强有力地主张自己，必须充满自信地在所有领域登场，尤其是重新进入政治领域。为此，儒家必须论证，自己具有创制立法之能力。而且，只有回归儒家之法度，新的体制才具有文化的正当性，才是可运转的。儒家若在大转型时代的制度构建中缺席，则必然在教育、文化、社会等所有领域中被逐出局，而无任何存身之地，那时，儒家塑造中国人心性、养成君子之功能，也就完全无从谈起。如蒋庆先生所指出者：

政治不同于经济、法律、教育等领域可以相对独立，政治最直接地关涉到人的宗教信仰、价值理念、道德意识和文化认同，即直接关涉到人类文化的深层价值。如果某一政治形态改变，即意味着某一人类文化的深层价值改变；某一人类文化的深层价值改变，即意味着某一文化灭亡。故极而言之，政治形态亡则文化亡！〔1〕

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儒学之提出，为我国大陆儒家指出了一

〔1〕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页。

条生路。处在大转型时代，当代中国儒家必须回归其自古以来的整体规划，而绝不可自我局限于心性儒学或者文化教育领域。唯有如此，儒家之理念才有机会成为制度，也才有机会渗透到文化、社会领域中，如此，儒家才有可能复兴。更为重要的是，如此，中国之制度构建，才是在中国文明之脉络中进行，是华夏—中国治理之道的展开，而不是沦为外国理念之试验场地。如此之制度构建，才有可能是理性的，并促成中国文明之复兴。

需要强调的是，蒋庆先生并没有走向另外一偏。回到儒家历史中，历代大儒向来坚持儒家之整体规划，而无所偏颇：被视为心性儒学之开创者的孟子，对制度问题的关注，与对心性的关注，不相上下。宋明心性儒者如二程、朱子，也都十分重视制度问题。蒋庆先生本人同样坚持儒家的整体规划：世人皆知蒋庆先生力倡政治儒学，然先生在心性之学上用力极深。而这恰恰是儒家之正常生命形态。只不过为了矫正世俗之弊，蒋庆先生特别强调政治儒学而已。

由政治儒学之提出，配合心性儒学之余脉，大陆儒家恢复了其完整性。这就是蒋庆先生对中国思想演进之第一项贡献。

二、恢复中国学术之主体性：经学式写作

《公羊学引论》之意义不仅在于标举政治儒学概念，还在于以经学方式写作。《引论》自序中，蒋庆先生特别声明：

是书立言论事，一以公羊义理为准，故是书为公羊学著作，而非客观研究公羊学之著作，公羊学为今文经学，故是书亦为今文经学。此又读是书者不可不知也。^{〔1〕}

〔1〕 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此语看似平淡无奇，然而，放到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看，则无异于石破天惊。

大约到 20 世纪 20 年代，经学基本被摧毁，中国固有之学术体系也被摧毁，而成为学术史研究的对象。事实上，也很少有人研究之，直到过去十年，经学史才逐渐成为学界热门。具有象征意义的事实是，晚清著名经学家廖平之弟子们，虽受过系统经学训练，也纷纷放弃经学，而成为思想史、历史学或者古典文献学之研究者。因此，在 2004 年的《论“以中国解释中国”》一文中，蒋庆先生沉痛指出：

在这种西方学术霸权与殖民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学术同样遭受到西方学术的排挤压迫，中国学术的基本义理被颠覆解构，解释系统被驱逐取代，中国传统的学术丧失了话语权力进而丧失了话语权利，中国的学人已经不能按照中国文化自身的义理系统来思考问题与言说问题，中国的学术领域已经成了西方学术的殖民地。^{〔1〕}

西方学术范式完全取代中国固有学术范式，中国学术界遭遇全面殖民。蒋庆先生接下来列举了儒学被西方学术解构殖民的各种具体表现，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心性儒学之变异。熊十力、牟宗三诸先生虽主心性儒学，却基本不理睬传统心性儒学强调的“工夫”，而是致力于模仿西方哲学，构造儒家之哲学体系。于是，这一现代的心性之学与传统心性之学关注君子人格之养成的取向，也就完全不同，而变成了学院的智力事务。

由此，“中国儒学不能解释和理解自身，又遑论解释与理解其他学术（包括西方学术）与世界”^{〔2〕}。鉴于此，蒋庆先生倡

〔1〕 蒋庆：《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63 页。

〔2〕 蒋庆：《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63 页。

导“以中国解释中国”：

今日中国儒学的当务之急就是打破西方学术一统天下的霸权状态，回归中国儒学自身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重获儒学的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把儒学从西方学术的殖民与压迫中解放出来，使儒学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总之，今日中国儒学的当务之急就是以儒学解释儒学，以儒学解释中国，以儒学解释西方，以儒学解释世界。一句话，就是“以中国解释中国”，收回中国儒学界一百年来在解释系统上的“治外法权”。^{〔1〕}

以中国解释中国之要旨在“回归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重建以‘六艺之学’为本源的具有中国学术自性特质的中国学术体系”^{〔2〕}。具体地说，就是回归经学传统，在接续经学之基础上发展儒家的义理体系。这是一个思想的决断，学术的决断。蒋庆先生断然走出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范式，回向经学。在前者框架内，儒家义理永远只是被客观地研究、解剖的对象，甚至于新儒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研究”儒学。经学则致力于阐明儒家义理。

《公羊学引论》就是当代经学横空出世的一个标志。蒋庆先生不是梳理汉代公羊学在说什么，而是以公羊学家的身份言说，解释历史，尤其是就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言说。

这是学人立场的一次根本转换。这首先是现代儒学谱系的一次巨大转变。从一开始，儒家之学包括两个相互关联但又有明显区别的部分：经学，与作为百家学的儒学。汉儒固不用说，即便宋儒，虽发明理学，然小程著《易传》，朱子遍注五经。但

〔1〕 蒋庆：《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3～264页。

〔2〕 蒋庆：《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页。



现代儒学，尤其是港台新儒学，则与新文化运动时代反儒学之思潮采取同一取向：仅重视作为百家言之儒学，而忽略经学。这种偏颇似乎同样是受新文化运动之影响，将经归之于不可信。

蒋庆先生回归经学之决断背后，可见儒家具有永恒性、普世性之信念。20 世纪经学之死亡，源于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中国正在经历古今之变，包括经学在内的既有思想、学术体系只适应于古代，对于构建现代秩序毫无价值。儒学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并且，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体系，西方才代表着普遍性。蒋庆先生则回归经之本义：经者，常也。经学所守护的乃是常道，经学所阐明之义理，超越时间、空间，同时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基于这样的信念，蒋庆先生不像一般学者那样，站在儒学之外思考，而是站在儒学之内为圣贤立言。

蒋庆先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风气，经学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并进入当下学术体系中，尽管在大多数时候是以经学史的面目出现的。但不管怎样，经学重回学术建制，具有十分重大的思想史和历史意义。由于蒋庆先生，以及后来者的肉身之进入，古老的中国思想被注入生命力，开始在现实中发挥作用。

由此，中国人才真正地思考。经学为主的中国固有学术体系被摧毁，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在中国得以建制化。然而，一百多年来，身在此建制中之学人基本上都不是在思想，而是在进行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在大多数领域，中国学者忙着介绍西方之古典或最新思想、学术，或者忙着验证外国人提出的假说，或者进行中西对比研究。问题很简单：由于语言与文化隔阂，中国学人几乎不可能体会西方各种思想、学术之基础性预设，也无法完整地把握其学术的历史演变脉络。而由此，中国学人固然无法以自己掌握的西学解释西方，同样也无法以之健全地



解释中国：过去一个世纪中国人在几种思想、学术体系之间大幅度摇摆，就已经是一个噩梦了。

回到经学，进而回到中国既有学术体系，乃是中国思想、学术获得生命力的前提。基于蒋庆先生到目前为止的研究或可预料，透过经学之重建及渗透，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将获得一套关于人、关于天人之际、关于人际关系的中国式预设。由此预设出发，中国学人不仅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也可以丰富或者深化现有之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增强其普适性，从而更为有效地解释西方。

这就是蒋庆先生对于中国、乃至全球思想学术界之第二大贡献：唤醒中国既有思想、理念，恢复中国既有学术范式。由此，中国人开始思想，从而有可能丰富人类之思想。

当然，蒋庆先生之著述并非人们熟悉的传统经学式文本，即经解。先生在《政治儒学》自序中特作如下说明：

本书的基本理路是今文经学中的公羊学，所依经典是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学诸经，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是在进行经师式的学究性研究，而是意味着本书是依儒家今文经典的根本精神与政治智慧广论当今中国面临的学术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与现实问题。^{〔1〕}

蒋庆先生目前公开出版的三本书，其文体相近。这种文体是古老的，它确乎有今文经学之特质，类似于董仲舒之《春秋繁露》：面对现实，依据微言大义进行创制礼法。奇妙的是，这样的文体又是现代的，它使用的是现代的文本形态，具有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论说的外观，容易为现代学人所接受。也许，

〔1〕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页。



这是现代经学的一种经典文体。

三、恢复制度构建之主体性：宪政之再认识

立定了中国学术之自主性，蒋庆先生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宪政之中国式思考。

19世纪末甲午至戊戌期间，敏感的儒家士大夫已做出建立现代国家之政治决断。其中之关键正在于建立宪政制度。笔者的研究表明，儒家士大夫之此种政治决断，绝非西方“冲击”之结果。华夏治理之道就是宪政的，至少自董仲舒以来的儒家士人也部分地构建了这样的治理架构。也正因此价值和历史之基础，晚清士大夫遭遇西方宪政技术时，立刻就能接受，而清末新政、立宪时期在社会各个层面建立宪政各项制度之进展，也是极为迅速的。也就是说，清末立宪实乃中国既有政制之“新生转进”。

不过，民国初年宪政巩固之不利，引发新兴的、并且始终处于文化与社会结构之边缘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焦虑和愤懑，他们掀起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其中一个名义是“民主”。他们把传统中国之政治制度和儒家之政治理念，以“专制”一词笼统概括。这样，在主流的现代政治思考中，儒家与宪政对立，中国与民主对立。直到今天，即便在同情儒家的知识分子中，蒋庆先生所概括的下面看法，也极为流行：

他们只承认孔子是“心性的孔子”或“道德的孔子”，而不承认孔子是“政治的孔子”或“创制的孔子”；他们认为在当今中国只能有“孔子的道德”，而不能有“孔子的政治”；只能有“民间的孔子”，而不能有“宪政的孔子”……他们否定了“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即意味着否定了“政治

儒学”的“王官学”性质，但一个稳定良好的政治社会秩序又必须具有“王官学”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的政治史表明从古至今都没有无“王官学”的国家或政治，于是他们把另一个“王官学”即西方自由民主的“王官学”搬到了中国，作为中国公共领域的国家政治宪政原则。因此，他们不是不要“王官学”，而是不要中国孔子的或儒家的“王官学”，要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王官学”。〔1〕

此为现代知识分子之一般认知。即便新儒家之心性儒学，也是默认西方的民主为中国现代政治之唯一出路，他们所思考之全部问题则在于，如何从心性转出新外王，牟宗三先生为此而提出“良知坎陷说”〔2〕。

总之，现代中国精英群体之主流立场是，或许在道德心性上，中国人还可以继续保留儒家。但是，在政治与社会治理制度上，中国传统一无是处，中国政治之唯一出路就是全盘西化，一心移植西方之制度。20世纪以来，在政治实践与思想思考两个领域中，中国精英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蒋庆先生对此予以当头棒喝。“政治儒学”之提出，截断现代中国精英以西方王官学作为中国王官学之迷信，呼吁中国优良政治秩序之构建事业当回到中国自身，回到儒家智慧。可以说，这是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次根本转向。

蒋庆先生之所以提出此一理念，首先是因为，历史地看，从孔子开始，儒学首先是政治之学。退出政治，局促于心性领域，儒学就不成其为儒学。放弃创制立法之使命，儒家也就放

〔1〕 蒋庆：“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响应中国学界对‘政治儒学’的批评”，载蒋庆：《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9页。

〔2〕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7~95页。



弃了行道于天下的最重要手段，而必然在文化、社会与国家生活等各个场域中全面地边缘化。其次是因为儒家必须进入创制立法之过程，并主导之。这就是政治儒学的使命。蒋庆先生断然指出：“中国今后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之政治礼法制度当由‘政治儒学’重构，而非由‘心性儒学’开出。”〔1〕

因此，政治儒学不仅是儒家的生路，也是中国的生路。由此，蒋庆先生提出了建立中国式政治制度之命题：“中国当代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而要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就必须建立起中国式的政治制度。”〔2〕据此，蒋庆先生不能不自别于主流的政治理念：

在我看来，未来中国政治发展之问题是“福山问题”，即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能否突破福山所说的“人类离开自由民主政治没有另外的路，未来人类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自由民主政治自身的完善问题”。如果我们认同这一“福山问题”，那么，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就很简单很容易：在中国照搬西方的宪政制度。如果我们不认同这一“福山问题”，那么，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就很复杂很艰巨：我们要在中国建立独特的中国式宪政制度。〔3〕

蒋庆先生对民主制度的批评，当从这个角度理解。在政治思考之立场转换后，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福山站在西方政治演进的立场上主张“历史终结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多认同这一立场，西方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1〕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2 页。

〔2〕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25 页。

〔3〕 蒋庆：《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 页。